图书情报工作
第 65 卷 第 1 期 2021 年 1 月

以国际智库为来源的开源情报评价框架研究*

■ 邹婧雅　于亮　李刚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目的/意义]评价是开源情报工作的基础，国际智库作为开源情报的重要来源却尚未得到重视，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需求，建立智库领域的开源情报评价研究，旨在对智库领域的开源情报研究做出相关理论补充，为智库领域开源情报实践提供参考。[方法/过程]聚焦于情报收集视角，利用演绎法论证开源性是国际智库作为开源情报来源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智库自身特点，归纳出国际智库开源情报具有专业性、政策性、预警性、证据性和数据价值性等主要特征，为开源情报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并借鉴北约系统的评价方法建立对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框架。[结果/结论]在国际智库开源情报评价框架中，情报人员和专业领域人员需要建立合作，共同作为评价主体。同时，评价对象需同时兼顾对情报源评价和情报内容评价，其中对情报源评价重点关注智库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公信力，对情报内容评价的重点包含 8 个要素：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预测性、实践性、反情报性、可理解性和可回溯性。

关键词：国际智库　开源情报　情报源　情报评价　布鲁金斯学会　智库传播
分类号：G203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1.005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现今社会的“开放度”越来越高，形成了丰富的开放信息源，相应地也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从公开信息获取情报已经成为情报收集的主要对象，开源情报工作日渐兴起。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简称 OSINT)最初是面向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服务，对开源情报的认识通常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前者限定为情报源和情报内容的开源，后者在此基础上还强调情报工作本身的开源[1]。美国国会、中情局、北约组织等一些重要机构及相关专家也对开源情报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尽管未能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它们本质上存在相同之处，认为开源情报是将那些可以公开并利用的信息作为情报来源，并在实际情报工作中使用这些信息解决情报需求。由此可知，情报来源在开源情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传统秘密情报工作，开源情报强调的“开源”主要是为突出情报来源的公开性。根据信息研究中的 DIKI 理论，信息链是由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依次生成的，情报是对原始的数据经过一系列收集、处理、加工和分析形成的产品[2]。因此，开源数据是开源情报形成的开端和来源，一般是指可公开获取的原始的、未经加工的一手资料，如一篇文章、一个广播节目或一段口述等；这些数据单独来看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或价值，但通过加工整合在一起后可以形成有实质意义的信息，产生情报价值，同时借助一定的知识背景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情报产品。海量的开源数据来源为开源情报提供了大量优势，使开源情报的形成过程普遍具有低成本、高收益等特点，开源情报在当代情报工作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已有多项研究都揭示了开源情报在当代情报工作中占据重要比例，其中前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D. Allen)提出的 80% 定律是最早关于开源情报的量化判断，认为开源情报占政府所需情报总量的 80%[3]，该数据之后被频繁引用。这种观点也渗透在多个行业领域，如 R. W. Winks 曾指出在获取的国外情报中有 90% 是来自公开信息源[4]；企业信息管理的研究者同样认为，企业在获取竞争情报时有 90% 的信息可以通过公开数据获取[5]。但开源情报在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JZD00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邹婧雅(ORCID：0000－0003－2428－176X)，博士研究生；于亮(ORCID：0000－0001－5546－1355)，博士研究生；李刚(ORCID：0000－0002－7356－7388)，博士生导师，教授，通讯作者，E-mail：ligang@nju.edu.cn。
收稿日期:2020－12－21　修回日期:2021－01－19　本文起止页码:24－33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邹婧雅，于亮，李刚. 以国际智库为来源的开源情报评价框架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24-33.

整个情报体系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地理空间情报、人力情报、信号情报、图像情报等其他类型的情报之间存在交集,甚至贯穿于其他类型的情报工作流程。并且,开源情报有利于其他类型情报的获取,尤其是为获取非公开情报来源提供入口。

开源情报在成为情报工作长期重要发展方向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对“开源”对象的分类界定,这决定了开源情报工作的对象范围。现有的分类主要依据开源情报的来源渠道,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美国陆战部[6]关于来源对象的分类,认为开源情报可分别来自学术机构、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图书馆和各类研究中心、商业性或公共性信息组织、个人和团体这几种渠道。另外,著名的兰德公司则依据信息来源的内容形式将其分为4类:新闻媒体类来源(如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灰色文献来源(非媒体机构发布的文献等)、长文本社交媒体来源(如博客)、短本文社交媒体来源(如推特、脸书等)[7]。面对多样化的情报来源,如何识别可靠的信息源,并获取更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是开源情报的关键。具有开源属性的专业机构对此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国际智库作为专业的决策咨询机构,不仅拥有专业的知识,蕴藏丰富的智力成果,并且拥有多样化出版物、网站、社交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同时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传播网络,具有天然的公开信息源优势。根据2020年最新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显示,全球智库数量约8 248家[8],它们从事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研究工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显著现象,充分利用庞大的智库群产生的公开信息也为开源情报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尤其是在当今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的时代,国际智库机构或将成为获取国际社会情报的重要来源,为开源情报工作提供更可靠的信源支持。

对此,一些国家已经在实践领域采取了相应行动,如俄罗斯的情报工作早先为追求经济发展,曾将智库机构明确列入情报收集的重要来源[9]。而我国情报工作也逐渐重视从国际智库获取情报进行分析,相关情报机构已组织专业人员对国外智库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汇编,重点收集国际智库对华言论或对华研究,为国家战略、对外关系等政策制定提供情报支持。尤其在科技情报领域,针对不同主题和领域,一些情报研究团队形成了专门的对国际智库成果跟踪监测和收集机制。但由于理论研究落后于实际需求,国内研究者目前对国际智库的研究仍主要关注于经验的学习、借鉴和比较研究中,尚未对国际智库的开源情报价值予以关注,理论研究的缺失不仅无法为相关开源情报实践提供支持,可能还会限制实践的发展进程。针对这一现象,本文着眼于开源情报的来源视角,重点解决两个问题:①国际智库为什么能够作为开源情报来源?②评价作为开源情报工作的基础,如何对从国际智库获取的开源情报进行评价?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结合国际智库的建设特点,利用演绎法对从国际智库获取开源情报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由于开源性是开源情报工作的前提,国际智库是否具有开源属性是开源情报工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分析国际智库开源情报具有的价值特征,从而为开源情报评价提供依据,并通过构建对国际智库开源情报评价的理论框架,对智库领域的开源情报研究做出有益的理论补充,同时为开源情报实践提供相应的参考。

2 相关研究现状

2.1 智库与情报研究现状

根据智库发展的历史可知,智库机构自产生以来就与情报有着深厚渊源,由于我国情报机构内涵的宽泛性,智库研究近年来成为我国情报学领域的学科增长点,关于智库和情报之间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比较研究,旨在分析智库和情报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国外智库工作和情报工作泾渭分明的局面相比,国内相关研究通常认为二者之间既存在区别也存在联系。在区别上,情报研究的核心是数据采集、分析和量化处理,智库研究的核心是基于数据和事实的政策分析和咨询[10]。情报研究更偏向于“耳目”和“尖兵”作用的发挥,“参谋”职能较弱[11],但后者正是智库工作的核心,并且情报研究即使提供决策咨询业务,也不同于公共政策领域智库的决策咨询[12]。通过智库和情报的对比研究,二者确实存在差异,但由于这种差异特征有时并不明显,致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对界限的划分主要取决于情报服务的层次。如陈峰[13]认为情报服务的价值按照信息服务、情报服务、管理决策咨询服务、思想智慧服务4个层析依次递增。栗琳[14]将其划分为战术情报、战役情报和战略情报三个层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智库研究是情报研究的延伸,高层次的情报服务能够发挥智库功能。

第二种类型是融合研究,即智库与情报工作相互交融、相辅相成。一方面,智库工作离不开情报服务[15],图书情报机构能够在这方面为智库提供更加专业的支持,因此图书情报领域研究者对此展开了大量

讨论,包括图书情报机构参与智库服务的优势和不足[16]、路径[17]、创新服务机制[18]等多角度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从建立智库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19]转向推动情报机构与智库机构建设融合[20]及实现向智库转型[21-22]。另一方面,智库的产品生产过程实际也包含具体的情报分析工作。其中,丁璐璐等通过访谈调研发现,结构化知识呈现、情报分析主体和客体、机构自省维度[23]等都会影响智库的情报工作;同时另有一些研究则结合国际智库机构案例,如兰德公司[24]、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25]等,具体分析智库在研究中对情报的获取和利用。此外,将情报分析技术应用于智库评价领域也备受推崇。从情报学研究者角度看,情报思维、方法和工具应该贯穿整个智库评价过程,并且要以情报价值引领评价导向[26]。从个体研究者到第三方研究机构,分别建立了综合能力、影响力、传播力、竞争力、媒介生态等不同视角下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许多研究也已经对此进行过梳理,在此不多赘述。

由此可知,研究者基于智库与情报研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各领域的专业知识,已经从多个方面探索了智库及智库研究与情报研究的相关问题。然而,尽管智库的情报功能已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但从智库情报功能发挥的方向性上分析,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智库的情报输入方向,即智库在研究生产过程向外抓取情报或外界主动为智库提供情报;但对智库的情报输出方向上却鲜有关注,即智库向外提供情报或将产生情报价值。因此,后者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2.2 开源情报评价研究现状

由于开源情报的来源多样化,低门槛的获取条件在提供丰富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主要在于情报源的准确程度、可靠程度及其价值参差不齐,对开源情报的来源进行评价在开源情报整体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其他方面,可靠性是对公开情报源评价关注的焦点,赵小康等[27]认为这种可靠性同时包含信息的真实性和专业性,并提出了针对信源评价的4项指标:形式特征、组织特征、链接特征、价值特征。由于开源情报是情报源的一种特殊类型,在评价时既遵循一般情报源的普遍规律,也因具体领域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在科技前沿情报领域,曾文等[28]制定的开源数据价值的评价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基本特性(权威性、影响力、关注度)、内容特性(领域相关度、完整性)、前沿特性(时效性、新颖性、领域交叉性)。在文献情报源领域,王秀成[29]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制定了5项评价指标及相应评价流程,包含情报的新颖性、可靠性、完整性、传播及时性及叙述内容的简明性。在对网站情报源分析领域,北约组织提出了准确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客观性、实效性和关联性5个方面的标准[30]。这些都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开源情报提出的一般性评价指标。

除了静态的指标评价方法,L. English提出信息质量评估的焦点应从数据和信息本身转移到信息用户或信息的生成过程[31]。邹培[32]针对开源数据,建立了包含数据过程、数据关联和情景分析、情报专业知识三个维度的评价框架。在对开源情报评价指标关注基础上,研究者还从评价工具等其他方面做出了相关探索,如D. Noble[33]提出并创建一种新型数据收集和信息管理工具的基础上,对以报告为主体的开源情报实施结构化处理,提取关键特征的信息框架,提升了这类开源情报评价的客观性。

综上,评价问题在开源情报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建立评价分析的通用性框架也是目前开源情报评价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具体的评价要素根据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特征呈多样性。随着社会分工体系的专业化,开源情报工作的主体逐渐由传统情报人员转向领域专业人员,情报评价也需要因地制宜,建立各领域、各行业内的开源情报评价对整体情报工作而言至关重要。而目前关于智库领域的开源情报研究尚未形成,对智库来源的开源情报分析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和评价分析。

3 开源性是国际智库的基本属性

3.1 国际智库在身份属性上具有开源性

从法律层面上看,许多国际智库都是以非营利组织形式运营的,这意味着智库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公共利益为优先。以美国智库为例,大多数美国智库都是根据税法501(c)(3)条款登记注册的,该条款是针对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基金会、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予以减免税收的规定,也作为智库运作的法律依据。非营利的法律属性要求智库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同时必须承担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法律义务。法律条件的规定为许多国际智库提供福利的同时,也在智库与其他有私人利益性质或营利性的机构之间划清了界限。这些智库按照法律要求不能以追求营利为目的,还要及时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资金来源等信息,证明自身工作的客观性。除了法定身份,智库的使

邹婧雅，于亮，李刚. 以国际智库为来源的开源情报评价框架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24－33.

命和定位也为开源性提供了保障。国际智库从事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决策咨询,追求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脱离公共政策领域的就不属于智库范畴。公共政策在西方社会发展以来,就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发展的逻辑起点,它要求智库的决策研究及相关工作开展不能脱离公共参与。国外学界通常把智库作为连接决策者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34],向上与决策者建立沟通,向下与公民社会建立连结。这就意味着智库也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一类特殊的公民社会团体,代理公民发声是智库应尽的责任。除了向上将公众声音反馈给决策者,同时也将决策相关信息向下传递给公众,引导公众舆论,并对公民社会的话语体系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公共沟通与传播是国际智库不可分割的部分,也会相应地产生大量公开信息,成为公开情报来源。

3.2 国际智库对自身传播的重视提供了大量开源信息

国际智库所处的政策思想市场竞争激烈,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影响力才能在竞争市场存活。传播是国际智库建立影响力的重要一环,通过传播智库思想、观点、价值观和成果,获得更为广泛受众的认同,从而建立起品牌形象和知名度,才能真正进入决策服务圈层。但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科研机构,学术传播主要通过发表论文、著书立论、学术会议等方式实现,受众大多为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智库传播不仅限于从事决策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内部圈层,还重视影响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盛行时代,信息传播与信息获取比以往更为容易。为提升影响力,国际智库非常重视利用媒体,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体宣传其理念和政策,让更广泛的群体受众了解到智库的观点。因此,媒介性是智库不可或缺的属性,媒体化发展也是国际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35],有助于智库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信息传播网络。从开源情报的视角来看,智库利用各种传播渠道,极力让自身成为目标受众的信息源,这些实际上为开源情报的获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智库而言,不仅重视传播渠道的建设,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发布的成果亦是层出不穷。以国际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网站上会定期发布报告、出版图书、发表论文、出品视频,信息类型多种多样。笔者在统计后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在 2019 年全年在 Web of Science 可查询到的学术论文达 109 篇;根据 2019 年的年报显示[36],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间,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 32 本图书;同时,布鲁金斯学会重视利用网络和新媒体传播平台,该年度其网站增加了 15% 的访问总时长,访问人数增加 3%,Instagram 关注者增加 64%,在 YouTube 上分享了 196 条视频,同比增加 37%;播客下载量超过1 000万,新增60 000名简报订阅用户。通过对过程和结果双重控制,该智库在为自己赢得更多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外界提供了大量可获取的且有原创价值的信息。

3.3 国际智库是处于社会网络中的开放性机构

从社会网络结构看,智库并不是处于一个封闭的人际网络中,而是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机构。这种开放性使智库拥有良好的跨界能力,能够实现跨越不同场域之间的交流。学术界、政界、媒界、商界等不同场域都拥有自己的内在运作逻辑和占有资源,但很少有机构能够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而智库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既能作为各方交换意见、协调利益的集合地,同时也是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的枢纽。利用这一位置优势,智库通过吸收来自不同场域的不同资源,来维持自己的运营。其中,人员的流动是形成这种跨界能力的关键。由于智库拥有的信息除了来自正式交流渠道外,大部分依赖于人际网络的非正式交流,并且后者所获取信息的价值往往更高。面向现实的决策咨询需求,国际智库通常会组建自己的专家网络,利用自己的跨界优势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入驻机构或承担兼职工作。其中,以“旋转门”为代表的人员流动机制最为著名,它使智库专家可以游走于各个场域。智库通过这些专家可以与不同领域建立联系,也借由这些专家传递自己的观点。对国际智库而言,跨界能力不仅包含跨越不同场域,也体现在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国际智库不仅立足本国(本地区),而且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各种成果或活动为载体向国际进行思想输出是最为常见的方式,以此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还有一些国际智库专门开发了对外交流的项目并建立全球专家网络,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承接国外官方组织或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担任国际顾问等;一些智库甚至作为“二轨外交”的铺路者,主动与国外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为国际关系做好沟通。

4 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价值特征

由上述对国际智库开源属性的分析可知,国际智库可以作为开源情报的重要来源。从国际智库获取的情报既具有开源情报的一般性特征,同时结合智库工

作特点又具有专业性、政策性、预警性、证据性及数据价值性等特性。

4.1 专业性

国际智库作为专业从事决策咨询的研究机构,产生的信息和知识也相应地具有专业性,并且专业性水平受机构属性、机构组成及机构产品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首先,在机构属性上,国际智库通常是非营利性质的机构,旨在生产公共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这要求智库必需是基于客观的立场开展研究及相关工作,因此智库非常重视标榜自己的独立性,"独立性"标签也成为国际上衡量智库专业能力的常见标准。其次,在机构的组成上,智库的专业知识生产依赖于专业的人才队伍,尤其是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家作为国际智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专家通常是来自相关政策研究领域的翘楚或具有资历的专业人士。除了专家,专业的研究团队也为智库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由于现实的政策研究问题往往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国际智库的研究团队通常招募受过某种专业学科训练的博士或硕士,同时寻求专业背景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智库不仅拥有专业知识,也以各项产品为载体,并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利用不同的信息组织和加工方式,将这些专业知识呈现出来并进行传播。

4.2 政策性

在开源情报工作中,对情报源核心价值的判断有助于更有效率地捕捉所需情报。智库的核心功能在于决策咨询,与其他机构相比更加凸显资政研究的特征,会产生大量具有政策性功能的信息。政策性通常是和学术性相对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二者在研究的过程、方法和技术[37]、行业主体、工作内容[38]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虽然智库研究离不开学术研究作为基础性保障,但智库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学术性研究工作,学术性研究只是智库研究环节中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往往是遵照一系列科学流程完成的规范化文本,学科导向性和理论导向性更强。而智库研究成果则主要面向现实的政策问题,能够对决策问题形成预判,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前瞻性价值,同时跨学科或多学科特征较为明显。并且,从情报收集角度看,国际智库的信息传播主要依附于智库成果,智库成果信息输出的主要价值也不在于学术性价值,而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政策观点。此外,这种政策性还体现在智库工作的时效性上。国际智库常常处于一个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这正是由政策研究咨询的性质决定的。政策研究主要是以问题或议题驱动为主,并围绕热点问题和前沿政策议题开展工作,现实决策世界往往变化莫测,需要智库随时待命,及时对外部决策环境需求做出回应,未能及时发声或过长的成果产出周期都会影响智库研究的实际效用。

4.3 预警性

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一些重大政策、法规时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政策辩论过程,智库正是通过政策辩论的方式积极地介入政策议程中。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国会实际上拥有立法权,通常情况下在重大立法政策出台前,或就社会重要事件调查时,国会都会举办听证会来收集各方意见,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政策辩论的过程,各方观点借由听证会在此针锋相对。其中,智库专家受邀出席听证会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智库意见在国会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备受重视。同时,智库圈内部也会经常举办辩论赛,通常是以社会最为关注的公共政策问题为背景,不同立场的专家聚集并展开辩论。因此,许多实际的政策议题还未发展成熟前,对相关议题的辩论可能早已在智库圈得到过激烈讨论。当某一问题已经成为智库辩论过程的关注点时,围绕相关问题形成的信息其实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并且这类情报往往会释放出某些政策信号,具有一定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功能,能够对未来决策现实提供预警。尤其是在美国对华政策领域,智库参与的政策辩论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在对华态度上采取的政策导向,例如对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早已在美国智库圈盛行,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对此的充分关注。

4.4 证据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随着循证决策的发展,证据对智库研究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由于"证据"一词本就源于法律术语,在法律中只有符合某个标准的才能被视为证据,尽管在循证决策领域的应用并不同于法律场景,但也有法律证据的影子[39]。对证据的需求强调智库产品并非拍脑袋、天马行空的主观臆想,而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科学研判。智库研究者需要充分收集研究所需的各项信息、数据,利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通过严谨的研究和论证,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因此,国际智库大多非常强调以"基于证据"的智库研究范式,像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知名智库还建立了专门的循证研究网络,加强证据建设。从这一角度看,智库的产品包含了对大量证据信息的收集,这些证据内容丰富,不仅局

限于传统的科学研究领域,也有来自专家的隐性知识和多方面社会考量因素等,具有综合的证据价值。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提升了智库研究的可靠性,同时证据本身就可以转化为情报,甚至在决策情景中被视为情报,并且作为更可靠的情报信息。

4.5 数据价值性

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机构,其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加工处理。由于国际智库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智库工作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其中有一类就以从事社会调研和发布调研报告为主,如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大学的 NORC 等,这类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大量的原始数据提供支撑,数据也是政策文本制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皮尤研究中心作为这类智库的标杆,围绕不同主题领域,通过采用多种调研方式获取大量的数据样本,支持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在此基础上,皮尤研究中心建立了"问题库""PPT 素材库""方法库""多媒体资料库"等多个数据库[40],以便于实现对数据的管理。除了通过调研获得数据,像皮尤研究中心、布鲁盖尔研究所等智库还会开放一些数据集的使用,如根据具体的研究项目情况,在一定保密期限后将相关议题中产生的统计调研数据在网站上公开,实现数据的社会共享和二次研究利用[41]。推动数据的开放获取和利用也使一些智库的影响力超越公共政策领域,被教育、商业等其他领域作为相对可靠的数据来源频繁引用。

5 构建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框架

开源情报并不是成品情报,而是为情报分析提供的一种原始情报,对原始数据和信息的质量评估是关键,贯穿于开源情报工作始终。但本文对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主要面向情报收集过程,偏向于情报分析前端,由于智库政策研究领域多种多样,不同领域之间对情报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在此并不涉及具体政策研究领域内情报效用和内容价值的评价。对此,本文主要借鉴北约系统(Admiralty Code)的评价方法构建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框架,该系统主要用于评估情报收集项目,对信息的评估包含两个维度:信源可靠性(reliability)与信息内容的可信度(credibility)[42]。对前者的评价依赖于更多客观因素,对后者的评价则需要结合主观分析和判断。因此,在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框架(见图 1)中,由于国际智库建设的专业化分工趋势明显,就评价主体而言,情报人员和专业领域人员应建立合作,将二者的专业特长相互融合,共同作为开源情报评价的主体,并结合主客观因素开展评价工作。而就评价客体而言,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应该由情报源和情报内容评价两部分组成。其中,对情报源可靠性的评价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主要是作为评价情报内容质量的手段[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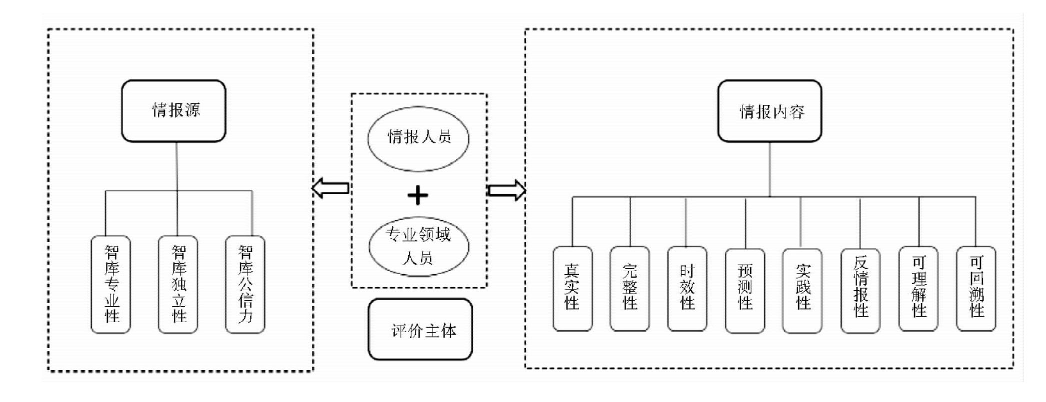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智库开源情报评价框架

5.1 情报源评价

根据信息研究的相关理论,可靠性是对信源要求的最关键的特征。C. I. Hovland 等基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信息源可靠性取决于专业性与可信度两方面因素[44],后续许多研究也都把这两方面作为评价信息源可靠性的因子。对公开情报源的评价其实就是对情报源进行筛选和分类,发掘出那些真正具有开源情报价值的国际智库。一方面,国际智库的专业性主要由智库运营的专业化程度和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决定,其中专业化的运营团队和规章制度是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而在人才队伍中,专家通常作为智库的核心智力资源,智库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由这些专家主导的,专家是否在相关政策领域具有资深的专业研究能力、是否具有一定

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智库来说非常关键。除了明星专家，智库研究团队的建立及其成员也从不同方面为智库产品输出做出了贡献。由于政策研究大多是跨学科、多学科导向的，不同专业背景成员组成更有助于提升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专业化的智库成果也是智库专业化的产物，遵循数据驱动和基于证据的智库研究范式产出的成果往往拥有更高的专业度。

另一方面，就机构自身的可靠性而言，智库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是评价的焦点。独立性能够保证智库产出的客观性，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由于大多数国际智库采用企业运营模式，治理架构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智库的独立性，需要关注国际智库的治理主体及其成员组成情况，是否拥有理事会、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相应的治理团队，各治理层人员的组成情况如何，以及治理团队成员背景的多样性。资金来源也是影响智库治理情况的重要因素，国际智库一般非常重视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不仅是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营，更有助于降低智库独立性受损或研究受干预的风险。通常情况下，智库为了赢取资助方信任，每年会将自己的资金来源状况公布在年度报告中，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另外，智库的公信力则关乎智库自身的声誉，通过新闻媒体或第三方机构的报道有助于了解智库的口碑高低，从而在情报收集过程着重关注那些声誉更高的国际智库，寻找优质信息源。

5.2 情报内容评价

情报内容是对国际智库开源情报评价的核心。由于智库机构产生的信息不是单一形式或单一维度的，而是复合型信息，因此以国际智库为来源的情报内容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对内容的评价主要涉及以下 8 个要素：

5.2.1 真实性

真实性是开源情报的首要考虑因素，要求情报内容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事实。在收集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过程，要考察情报包含信息的内容是否足够客观、可信，信息表述和相关结论是否是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信息提供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存在偏颇，否则会造成人为的歪曲描述，对后续情报分析造成干扰。除了对情报自身内容的考察，利用非智库自己传播的信息也有助于证实情报的真实。通过查考相关背景信息来检验是否与智库信息之间存在出入或相互矛盾的地方，从而评价所获取智库释放情报的真实度。

5.2.2 完整性

完整性包括情报形式特征的完整和情报内容的完整。在形式特征上，情报采集者在收集智库情报过程，需要明确情报的相关要素是否齐全，如信息发布者、撰稿者、发布时间、图片或视频的来源等，这些要素越齐全，收集情报的质量就越有保障，这些形式要素有时也能够为开源情报分析提供线索。在内容上，情报内容的完整性一方面主要依据具体的情报分析过程而定，另一方面在情报收集端要重视对碎片信息的整合，并建立信息之间的联系，后者是本文评价的重点。智库传播信息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要力求将智库中关于同类主题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收集齐全。

5.2.3 时效性

由于现实的决策世界往往问题层出不穷，造成国际智库快节奏的工作方式，信息更新的频率也相应较快。“慢工出细活”的研究并不适合解决实际的决策咨询问题，生产周期短的智库成果更能及时和灵活地回应现实的政策需求，例如智库发布的即时性评论、电视采访、专家研讨会等，这些成果往往也更具有时效性价值。尤其是在一些社会突发问题面前，快速地组织专家展开研讨是国际智库最常见的举措。因此在情报采集时，要重点关注智库信息的更新频率，并且可以通过对同一时间段的社会新闻和智库信息进行比对，观察智库是否能够及时发声。

5.2.4 预测性

由上文可知，预警性是国际智库的开源情报价值特性之一，预测性评价的重点就是关注情报是否具有预警功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国际智库作为战略前瞻观察和预测性研究机构[45]，需要长期对政策议程进行监控和跟踪，及时了解决策变化，推动相关议题及时进入议程，但这同时受到内外两方面触发机制的影响。外部主要由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决策需求决定，内部则主要由智库的政策辩论引起，这个时期许多问题还未形成成熟的决策成果，但可能会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前兆或苗头。在采集智库开源情报时要关注情报是否具有预测性功能，发掘那些能够对未来政策变化和发展有预见性意义的情报。

5.2.5 实践性

国际智库的成果通常是信息量最丰富的情报来源，但不同于一般研究性机构的成果，对成果情报的评价更加注重实践性，而非学术情报价值。实践性强调成果是否能够作用于现实世界，为公共领域实际的决策需求提供对策建议，关注成果的应用价值。成果传

播的受众类型也可作为重要的参考，因为面向不同受众的成果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区别，例如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的专业文章面向的受众都是专业同行，侧重对学术理论的探讨，即使与政策或社会现实相关的研究也很难对决策者或一般公众产生影响。只有面向政策决策领域相关群体进行传播且具有强智库属性的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研究的实际效用，如咨询报告、政策简报、听证会出席等，这部分智库成果包含信息也更具有现实价值。

5.2.6 反情报性

由于许多国际智库在国际关系和国防政策领域有所涉足，可能会受到国外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关注。尤其是在国家博弈愈演愈烈的世界形势下，反情报工作不仅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智库作为与决策咨询密切相关的政策研究机构也被卷入其中。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智库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广的国家，国外政府利用智库从事情报工作已经引起一定担忧和重视[46]。一些智库为了防止自己成为国外政治势力的利用对象，也会采取相应地反情报措施。因此，在收集国际智库公开信息或与智库人士开展非正式交流过程中，要有敏锐的情报意识，辨别智库是否是情报机关伪装的机构，或是通过公开的信息传播故意释放某种信号隐藏本身意图，引导舆论导向，要对智库的立场和传播动机进行审视。

5.2.7 可理解性

以往关于情报可理解性的解释大多是针对用户而言，主要由用户认知和理解水平决定。但本文对可理解性的解释与此不同，关注的是情报内容使用的语言。由于公共传播是国际智库的重要职能，相较于晦涩偏僻的专业术语，智库通过公共平台和媒体传播的信息应该使用易于公众理解的语言。其中包括智库开设的博客、撰写在线专栏文章、发布的公共演讲等，其中应该有大量通俗性的表述，如以公共演讲为例，TED 作为国际著名的公共演讲平台，许多来自国际智库的专家都曾受邀发表演讲，但要使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听众才能接收到演讲者所传达的观点。

5.2.8 可回溯性

在对开源情报获取的大量信息中，大部分应该都是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已经固定的产品为主，并且其中文本型产品占据智库信息的绝大多数。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研究机构，知识文本型产品的生产[47]本就是智库最擅长的，产量也远大于其他类型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存在一个弊端，主要在于文本型产品很难传递产品的生产过程，难以把握最终输出信息的来龙去脉。因此在情报评价时也要考虑情报的可回溯性，要将采集的信息还原至它所形成的时空背景中，还原情报的生产链，建立所获情报相关的“背景”信息或“情景”信息，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智库开源情报的效用。

6 结语

在中国特色情报学发展背景下，智库与情报之间存在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伴随新型智库建设的深入发展，围绕智库与情报之间的研究也有一定积累，但现有成果主要聚焦于智库的情报输入方向上研究，即智库从外界获取情报服务，而对智库的情报输出却鲜有关注，智库自身的开源情报价值未能引起重视。因此，本文从情报收集视角展开思考，对国际智库的开源属性展开论证，国际智库的开源性使其作为开源情报的重要来源，并且能够提供具有专业性、政策性、预警性、证据性和数据价值性为主要价值特征的开源情报。对情报的评价是开源情报工作的基础，本文借鉴北约系统评价方法，构建了对国际智库开源情报的评价框架，由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两部分组成，评价客体同时包括情报源和情报内容，其中对情报源的评价要重点关注智库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公信力；对情报内容的评价则需注意考察智库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预测性等 8 项要素。需要注意的是，开源情报离不开情报分析技术和领域专业知识的支持，该评价框架主要应用于情报收集阶段的工作，对框架的利用不仅依赖于客观因素的考量，也有赖于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和专业素养。在理论研究领域，本研究旨在提供一些理论思考并引出潜在的研究方向，但也存在一些局限，理论框架的应用在实际的情报工作可能需结合具体的实践情况做出调整，需要更多实践案例进行检验，笔者希望以此为开始，针对这一主题做出更多深入的研究，也期待各位学界同仁加入讨论，一同为我国开源情报事业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1] 丁波涛. 国外开源情报工作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11(6):103－106.

[2] 莱特克里菲. 情报主导警务[M]. 崔嵩，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3] CHRISTOPHER H, MATTHEW M, DANIEL S, et. al.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approaches and opportunitie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9.

[4] WINKS R W. Cloak &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

1961[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MCGONAGLE J J, VELLA C M. A case for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J].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2, 36(4): 35-40.
[6]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FMI 2-22.9)[EB/OL]. [2020-12-12]. 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fmi2-22-9.pdf.
[7] WILLIAMS H J, BLUM I. Defining second generatio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 for the defense enterprise[EB/OL]. [2021-01-10].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964.html.
[8] MCGANN J G.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20.
[9]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Center. A counterintelligence reader, volume III: Post-World War II to closing the 20th century[M]. Washington, DC: Military Bookshop, 2011.
[10] 李刚. 从情报研究到智库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7,37(9):50-54.
[11] 陈成鑫,曾庆华. 情报研究视角下智库情报能力建设路径[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1):105-111.
[12] 周晓英, 崔佳佳, 唐宇萍, 等. 情报学的起源与方向——从布什的《诚如所思》谈起[J]. 情报科学, 2004 (2):129-132.
[13] 陈峰. 论面向高端用户提供情报服务的四个层次[J]. 情报杂志,2016,35(10):13-17.
[14] 栗琳. 情报机构视域下情报, 智库与战略决策关系透析[J].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1(5): 31-36.
[15] 李北伟,李阳,李佳逸,等. 信息安全视域下的智库情报服务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5):61-67.
[16] 孟巍. 图书情报机构对国家智库建设的支持研究[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38(12):123-124.
[17] 王琪. 图书情报服务建设新型智库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21(12):155-157
[18] 朱波,张姝末. 基于数据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新型智库知识服务机制研究[J]. 图书馆学刊,2019,41(9):80-83,87.
[19] 祝红艺. 开放科学视角下图情机构与智库组织合作机制研究[J]. 图书馆,2020(12):14-19.
[20] 彭瑛,李树德,曹如中. 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 情报杂志,2019,38(8):90-96.
[21] 赵浩玥, 程刚. 新型智库视域下科技情报机构研究进展[J]. 湘南学院学报, 2020, 41(4): 120-125.
[22] 栗琳,卢胜军. 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情报机构转型研究[J]. 科技情报研究,2020,2(2):1-19.
[23] 丁璐璐,徐恺英,李欣颖. 智库情报收集环节质量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扎根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1):78-86.
[24] 黄晓斌, 丁孟思. 兰德公司项目研究的信息来源分析——基于2010-2019 年有关中国问题研究报告的引文调查[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10-2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201022.1806.002.html
[25] 陈峰. 情报与智库双重视角的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解析[J]. 情报杂志, 2019, 38(10): 53-59.
[26] 张颖, 初景利, 栾瑞英. 情报视角下的智库评价[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10): 69-73.
[27] 赵小康, 周爱民. 公开源情报的基础性价值及可靠性评价研究[J]. 情报杂志, 2011, 30(10): 16-20,63.
[28] 曾文, 李辉, 樊彦芳, 等. 开源情报环境下的科技前沿识别体系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 42(7): 30-34.
[29] 王秀成. 关于情报源定量评价问题的探讨[J]. 情报科学, 1986(3): 28-35.
[30] NATO. NATO OSINT handbook v1.2 [M/OL]. [2020-11-10]. http://www.oss.net/dynamaster/file_archive/030201/ca5fb66734f540fbb4f8f6ef759b258c/NATO%20OSINT%20Handbook%20v1.2%20-%20Jan%202002.pdf.
[31] ENGLISH L. Proces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how improving information production processes improved information (product) quality[C]// FISHER C, DAVIDSON B.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quality. Cambrid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2: 206-209.
[32] 邹培. 开源数据评估与使用探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 42(10): 52-56.
[33] NOBLE D F. Assessing the reliability of open source information [C]//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fusion. Par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formation Fusion, 2004: 1172-1178.
[34] 任恒. 国外智库研究的兴起与进展[J]. 情报杂志,2020,39(7):59-66,113.
[35] 李羿. 推动媒体与智库融合发展[J]. 现代国企研究,2015(15):44-51.
[36] Brookings. Brookings 2019 annual report[EB/OL]. [2020-11-22].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11/2019-annual-report.pdf.
[37] 初景利,唐果媛. 论从学术研究到智库研究的转化机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11):1-5.
[38] 王文. 论智库与学术的异同[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2(2):24-32.
[39] 缪其浩. 组织决策中的"情报"与循证决策中的"证据"[J]. 科技情报研究,2020,2(3):1-12.
[40] 梁宵萌,刘燕权. 皮尤研究中心信息管理实践对学术图书馆智库服务的启示[J]. 图书与情报,2019(5):72-78.
[41]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to access Pew research datasets[EB/OL]. [2020-12-10]. https://www.pewresearch.org/2013/04/18/how-to-access-pew-research-datasets/.
[42] HANSON J M. The admiralty code: a cognitive tool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5,14(1): 97-115.
[43] LEMERCIER P. The fundamentals of intelligence[M]// CAPET P, DELAVALLADE T. Information evaluation. Hoboken: Wiley-ISTE, 55-100.
[44] HOVLAND C I, JANIS I L, KELLE H H.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45] 张志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4):1－12.
[46] TROMBLAY D E.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lligentsia: exploitation of U. S. think tanks by foreign pow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2018,31(1):1－18.
[47] 李刚. 高校新型智库治理与营运[J]. 决策与信息,2018(11):37－45.

作者贡献说明：
邹婧雅：论文框架设计，文献收集与梳理，论文撰写与修改；
于亮：案例收集与整理，写作思路设计；
李刚：提出研究方案，论文写作指导。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Zou Jingya　Yu Liang　Li G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intellige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work.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have not received attention or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lags behi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Research on evaluation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from think tanks aims to make relevant theoretical supplements to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research of think tank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this paper used deductive methods to demonstrate that open sourc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as a source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has affordances of professionalism, policy-oriented, early warning, evidence-based and data valu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evaluation.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Admiralty Code, the paper built a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intelligence personnel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need to establish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act as evaluators. At the same time, evaluation objects conclude both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ce sourc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ce content.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ce sources should focus on the professionalism, independence and credibility of think tank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ce content should consider 8 key elements including authenticity, integrity, timeliness, predictability, practicality, counterintelligence, understandability, and traceabili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source　intelligence evaluation　Brookings　think-tank communication